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
2010 年 6 月，頁 117-154

BIBLID1012-8514(2010)45p.117-154
2009.12.11 收稿，2010.4.19 通過刊登

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1950-1970）

陳　弱　水*

提　要

臺大歷史系的發展不僅是臺灣史學史上的一章，也見證了現代中國史學傳統的移轉、演進與變化。在臺大歷史系，1950 至 1970 年是由中國大陸來臺教授直接發揮影響的年代，本文即以這批學者為核心，觀察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的關係。全文首先勾勒現代中國史學思潮的發展，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形成之初，梁啟超（1873-1929）與傅斯年（1896-1950）即已顯現不同的方向。本文接著分析、描繪十二位臺大歷史系早期教授的生平、教育背景和學術特色，最後歸納討論這些學者的學術取徑。

本文認為，現代中國史學傳統可析分為史料派、解釋派、史觀派與義理派四種基本觀點，臺大歷史系早期教授帶來的學術因子，以重考證的史料派為主，受西歐影響的解釋派為從。這些因子在台灣逐漸與其他學術觀念產生密切接觸，造成臺灣歷史學複雜的情況，似乎一直延續至今。

關鍵詞：臺大歷史系　臺灣史學史　現代中國史學　學人群體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joshuichen@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探討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的關係，這既是臺灣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涉及現代中國的學術思想。

首先要「釋題」。這個題目有兩個元素，一是「臺大歷史系」，一是「現代中國史學傳統」。先談前者，「臺大歷史系」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並不然。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臺灣重歸中國統治。同年 11 月 15 日，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名國立臺灣大學，史學科改為史學系，後稱歷史系。所謂「臺大歷史系」，指的就是那個接收而來延續到現在的系所。一個學系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其中的經驗——即便只限於學術思想方面的經驗——也並不簡單。系裡有老師，有同學，也有行政人員，對一個系中成員而言，這些人在他的人生中，在他的學思歷程中，分量如何，其實很難說。以歷史系的學生為例，老師、同學並不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塑造一個學生的心靈或見解的力量，往往是外於這個學系的，譬如說：他所讀的書和文章，系外、校外的學者，社會上的思潮，世界大勢，還有往往更重要的，他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和經驗。我的意思是，一個學系的學術思想經驗往往是複雜、異質的，本文要處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遠遠小於系的整體學思經驗。我要談的是系裡的老師，從中國大陸來到臺大歷史系執教的教授，而且限於進入系裡時已經成學、成為獨立學者的教授。另一個納入本文的條件是，這些人必須在臺大歷史系長期任職，時間在十年以上或接近十年，換言之，必須是該系的基本成員。

再來說明題目中的時限：1950 年至 1970 年。以 1950 年為起點，是因為戰後臺大歷史系第一批的教學研究主力是在 1948 和 1949 這兩年分批進入歷史系。他們分別為莊長恭校長（1894-1962）和傅斯年校長（1896-1950）所聘任。這兩位校長都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的重要領導人。莊先生是福建泉州人，曾經擔任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更是大名鼎鼎，他是山東聊城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所所長。附帶說明，在 1950 年代初，大陸籍的教授大舉進入臺大歷史系之際，系中臺灣本地出身的老師有四位：楊雲萍（1906-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荊和（1917-1995）、徐先堯（1917-2007）、張美惠（1924-）（臺大教授敬稱略，以下同）。楊雲萍的主要學術背景是傳統中國文史，其他三位則是近代日本歷史學。[1]

至於討論臺大歷史系教授以 1970 年為斷限，有一點取其象徵意義，這就是臺大歷史系從大陸來臺教授中的一位主力姚從吾（1894-1970），在該年 4 月 15 日因為心臟病突發，死於研究室——即現在的歷史系第三研究室。不過要說明，1970 年跟 1950 年相比，情勢已經有了相當的變化，當時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的影響已甚強烈，中國史學整體籠罩歷史系，大概是到 1960 年代中葉。[2]無論如何，無可否認的，中國史學是臺灣戰後歷史學界最大的力量，而且這個情況延續了相當久，到現在還在發揮影響。在籠統的所謂「中國史學」中，有一個明顯的因素，就是「現代中國史學」。由於本文主題是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為了能夠清楚表達我的觀察，需要對所謂的現代中國史學多作一些說明。

本文題目使用「現代中國史學傳統」這個詞語，是表示，在現代中國，歷史學並不是處於散漫的狀態，而是有一個可辨識的新生傳統，這個傳統具有自己的特性。學界對於現代中國歷史學以及有關的學術思想問題，研究已經很多，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就世代的觀點而言，第一代現代中國史學家，特別是領導者，是一批出生於 1890 年代的學者，他們的學生們，就是第二代，而後還有第三代等等。下面有兩個圖表，圖一標示出現代中國史學界的若干重要人物，依世代區分為先驅、第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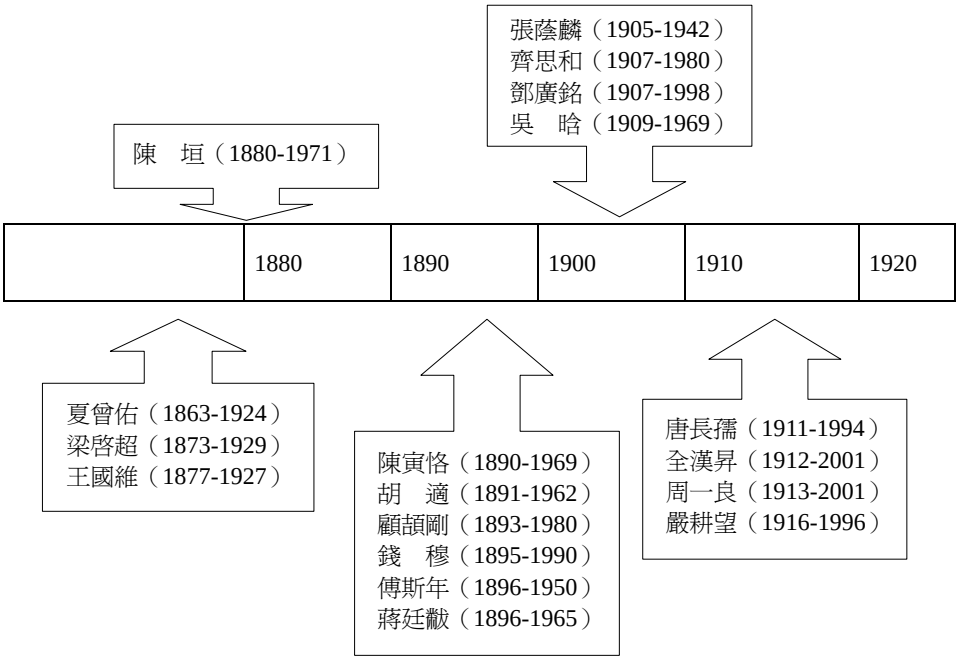
1 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1928-1960）〉，收入黃清連編，《結網三編》（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 334-335、345-348。四人之中，陳荊和與張美惠未能久任。陳荊和是重要的東南亞史（特別是越南史）學者，自 1958 年起轉任越南、香港、日本等地教職，居留香港最久。在港期間，也教授日本史，培養此領域之人才。關於他的學術業績，見周佳榮，〈陳荊和及其東亞史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2005 年第 3 期（香港），頁 121-130。張美惠也研究東南亞史，於 1954 年移居西班牙。據 1947 至 1953 年擔任臺大中文系事務員的陳瑳瑳女士相告，張美惠現仍健在。

2 關於 1960 年代中葉社會科學與科際整合治史觀念開始強烈影響臺灣歷史學界，可參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下冊，附錄一〈三十五年（1950-1985）來的臺灣史界變遷〉，頁 251-2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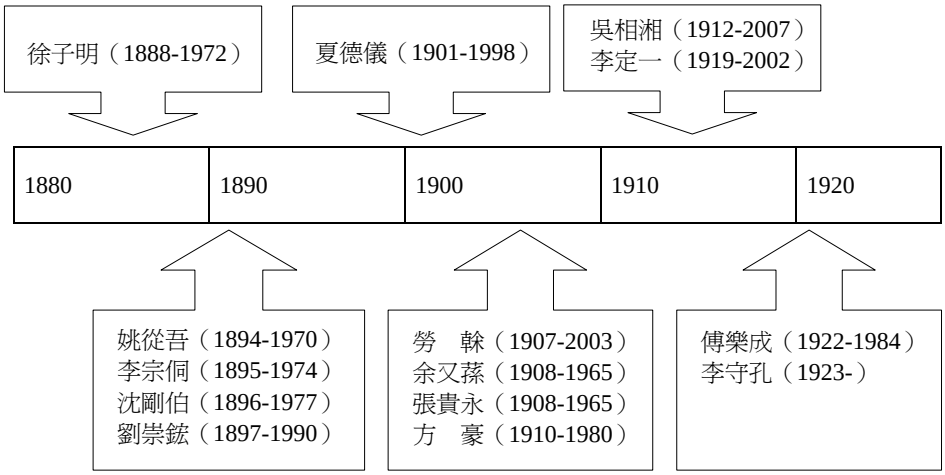
領導人、第二代學者。我標示出的重要先驅有夏曾佑、梁啟超、王國維；第一代學者有：陳寅恪、胡適、顧頡剛、錢穆、傅斯年、蔣廷黻；第二代則有張蔭麟、齊思和、鄧廣銘、吳晗等。1950 年時，第一代學者五十多歲，第二代學者三十多到四十來歲，進入臺大歷史系的學者，基本上就是這兩代人，共計 11 位；此外李定一可說介於二、三代之間，均見圖二。當時第三代學者才二十多歲，還是助教級的身分，臺大歷史系有兩位（傅樂成、李守孔），本文不討論。這裡也許可以說一句題外話，中國現代人文學術最有創造力的學者，明顯集中在出生於 1890 年代的一群人，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天才成群而來的年代，不過由於時局動亂的緣故，他們的成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圖一：現代中國史學重要奠基者示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二：臺大歷史系大陸來臺學者（Ⅰ）



現代中國史學傳統的基本性格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下，所形成的新的史學認識與研究實踐。關於現代中國史學觀念的起源，學者常以梁啟超發表於二十世紀初的兩篇文章為標誌：〈中國史敘論〉（1901）和〈新史學〉（1902）。我覺得這是相當恰當的。梁啟超的思想以龐雜多變有名，他的史學思想也是如此，可能比其他方面還要嚴重。扼要而言，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宣揚「新史學」，是以西方的歷史學為模範，他批判傳統史學，要求改革，但是到後來，特別是 1920 年代，不再突出西方的典範，也標舉中國學術的特色和優點。不過，梁啟超的史學觀有其一貫的地方，一段出自〈中國史敘論〉的話就表現了他的根本想法：

> 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3]

3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臺三版），第 3 冊，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段話顯示出梁啟超史學觀的兩個重點。一是，歷史不是有關統治者的記載，而必須以全體人群為對象。其次，歷史不能只是事實的紀錄，歷史學還要揭示因果關係，也就是，必須對史事有所解釋，藉此把零散分離的事象連接一起，使歷史大局得以明朗。梁啟超後來雖然淡化了西化的主張，這兩個觀點仍然是他的史學思想的基石。梁啟超史學觀的另一個要點是重視人類經驗的活動面，認為史家之能事在重現過往時代的生命。這個目標的達成也有賴於因果關係的建立，以此，〈新史學〉如是說：

> 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4]

梁啟超的思想雖然變化多端，經常彼此矛盾，顯得蕪雜，但也有視野廣闊、見識銳利的優點，他的心靈之開放，尤其是絕大多數人所不能及，令人欽佩。梁啟超可說是中國第一位現代史學思想家，他的史學思想是超時代的，到現在還有參考的價值。[5]

不過，就二十世紀前半葉（1900 至 1950 年）中國歷史學的發展看來，梁啟超所提出的種種觀念並不是現代史學的主流。佔據最高主流位置的是由胡適所開啟的科學的史學觀。與梁啟超的思想相比，胡適的重點在於，在文獻歷史化的基礎上，透過精確的資料考訂、證據的檢驗，求得系統的知識，而且特別重視知識的客觀性，他是在這些意義上師法西方學術，相對而言，並不強調史事的解釋。[6]把胡適的基本觀點發揚光

4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 4 冊，頁 4。

5 梁啟超史學思想之撮述，可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上冊，第一章。

6 略見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 2 冊，頁 27-29；〈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集》，第 2 冊，頁 327-328；〈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第 2 冊，頁 551-558；〈《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集》，第 3 冊，頁 5-17；〈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胡適文集》，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而且落實於學術發展的是傅斯年。我們可以看看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一文中的幾段話，並將其與梁啟超的看法做比較。傅斯年說：

> 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

又說：

> 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7]

傅斯年不但是中研院史語所的所長，對於北京大學史學系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於 1930 年代在北大開「史學方法論」的課，講義之中就說：「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8]相對來說，梁啟超的史學觀是特別注重疏通的。我個人認為梁啟超與傅斯年所代表的差別，是現代中國史學傳統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下文還會談及。

關於胡適、傅斯年史學思想的涵義以及和臺大歷史系的關係，後面還會有說明。這裡只想提出一點，以胡、傅為主導的史學思想之所以能成為現代中國史學的核心力量，除了領導人的能力、眼光，所佔據的位

---

3 冊，頁 79-86。前三文原收《胡適文存》初集，後二文原收《胡適文存》二集。

7 這兩段文字分見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第 4 冊，頁 253、262。

8 傅斯年曾四次開設此課。見尚小明，〈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學術關係〉，《史學月刊》2006 年第 7 期（鄭州），頁 82。引文見〈史學方法導論〉，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 2 冊，頁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置，所掌握的資源，個人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這種思想跟清代考據學接上了軌，既能利用中國學術既有的成果和方法，又使學人、學子易於了解領受。所以說，這個帶著科學面貌的史學潮流是有很強的傳統內涵的。

接下來，要對現代中國史學傳統再做幾點說明。首先，現代中國史學的興起，並不只是一個學術類別或學科內部的變化。事實上，歷史學在現代中國早期的人文學術佔有中心的位置，現代史學的興起標示著人文學術在中國的根本轉變。從晚清到民初，中國學術可說有個「去經學化」的趨向。清代考據學是以經學考證為中心，但經歷十九世紀末的巨變後，中國本有的核心文化信仰已大大失去力量，經典失去了神聖性與原理寶庫的地位。結果是，經典一方面被相對化了，另方面它又還是學者最熟悉的文獻，於是，經典就變成歷史文獻，真正實現了「六經皆史」的局面，史學取代經學成為人文學術的核心。這個情況清楚反映在第一代現代史學家的背景。圖一所列的學者中，只有蔣廷黻一人是學歷史的。胡適唸的是哲學，也不以歷史家自許。顧頡剛是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畢業。傅斯年在北大比顧頡剛高一屆，是國文門的，他到英國、德國留學六年，從來沒有上過一門歷史課，他本來唸自然科學，最後對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發生興趣。陳寅恪很早就有志治史，他雖然長期在國外，基本上遊學，至少就歷史學而言，可以說是高級的自學。錢穆更是高中都沒畢業，自學出身。簡單地說，除了西方的影響，第一代學者的學術憑藉基本上是傳統的經史之學，兩者相激，創發出新的見識，就是在這一群非歷史學出身的學者手中，現代中國歷史學誕生了。至於第二代史學家，大抵都是唸歷史的了。

從前面的說明，應該可以看出，所謂現代中國史學，並不能等同為現代中國的歷史研究或文史之學，在現代中國，不少人的知識觀、治學途徑還是承繼傳統的。於是，在人文學術中就有所謂的新派、舊派或新派、老派的區別。佔據新興學術機構高層位置的，是新派的學者。本文所談的現代中國史學傳統，指的就是新派學者所建立的門路。在現代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老派學問雖然常受到冷淡的對待，仍有其生命力，在 1948 年選出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余嘉錫（1884-1955）、楊樹達（1885-1956）可說就是老派學者的翹楚。

現代中國史學的陣營並不是一塊整體，其中存在著不少分歧，最常聽到的分歧可能是南派、北派。南、北派是因為學派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得到的稱呼。北派的象徵是北京大學，南派的象徵是南京的中央大學——還有它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14-1923）、東南大學（1921-1927），後來浙江大學史地系也是南派的大本營。南、北派之分，牽涉相當複雜，層次很多。第一個是文化思想的層次，這是最根本的。北京大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這個運動的領袖追求中國的現代化，推動巨大的文化變革，如白話文運動，並對傳統抱持批判的態度。北京大學以胡適為首的一些師生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1910 年代末、1920 年代初，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再後來傅斯年以中研院史語所、北大史學系為中心所推動的歷史學建設，都有強烈的建立科學性知識的意涵。在學術界，採取維護傳統的立場起而與北大抗衡的，是以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為陣地的「學衡派」。學衡派除了辦有文化性刊物《學衡雜誌》，它的成員還跟學術期刊《史地學報》有密切關係。這就是文史學界南派的起源。南、北派的第二個層次，是在學術思想——包括史學思想——方面。整理國故運動早期的主力是顧頡剛所主導的古史辨運動，可以想見，南派信古之心較切，對疑古思想採取批判的立場。此外，北派強調歷史學的目的在求得客觀的知識，不希望求真跟別的價值混淆，南派則有經世致用的想法。南、北派之分的第三個層次是機構歸屬。出身於北京主要大學或長期在北京工作的學者容易被看成北派，反之，東南地區大學出身的則常被歸為南派。由於南、北派是個複雜的現象，含有許多層次，兩者之間的界線很不清楚。譬如，在同一學校、同一學系任教的學者往往有不同的思想意態，以機構來劃分南、北派有時意義不大。又譬如，有些在文化意識不滿新文化運動而同情學衡派的人，對學術的看法卻較接近胡適、傅斯年，陳寅恪、湯用彤（1893-1964）都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這個類別。另一方面，出身北京清華大學、有史學天才之稱的張蔭麟（1905-1942），文化意識則近於南派。

這裡提出南、北派的問題，用意有兩點。第一，在文史學界，這是橫亙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重大分野意識，即使在早期的臺大歷史系，這個意識仍然存在。譬如，吳相湘在他的回憶錄《三生有幸》一書中說，系裡的老師除了沈剛伯，都是北派的。[9]這個說法可能值得檢討，但我們需要對這個分野有基本認識。第二，由於這個分野內容太廣而且模糊，它將不是我的討論中的主要因素，但不可能不提到。最後要強調一點，南、北派是因文化意識、學術觀點、教育機構的學風而衍生的劃分，與學人的籍貫沒有關係。現代中國繼承明清以來的態勢，學術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還是長江下游一帶，加上晚清新興的湖南、廣東也在南方，無論南、北派，學術界重要人物大都是南方人，像傅斯年這樣的山東人是很少見的。

以上花了一些篇幅介紹現代中國史學傳統，現在要進入臺大歷史系的問題。在 1950 年之前和稍後從中國大陸來臺大歷史系任教的學者，在現代中國的歷史學界佔有什麼位置呢？他們帶來怎樣的學術觀點和研究取徑？這是我試圖解答的主要問題。首先，我想說明這批學者的幾點通性。他們的第一個特徵是，就如前文所提，都是現代中國第一代、第二代的史學家，他們的事業跟現代中國史學的形成是緊密相連的。在這批學者中，佔有主導力量的顯然是第一代學者，於是，在早期的臺大歷史系，就形成師生年齡差距大，第一代教第四代、第五代的情況。其次，這些老師大多出身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機構歸屬而言，具有北派的面貌。

第三，就史學研究的業績而言，在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中研院史語所應該算是首屈一指的。該所所長傅斯年於 1949 年 1 月就任臺大校長，雖然次年 12 月就因腦溢血猝逝，在任期間有很多大刀闊斧的措施，是臺大校史上的關鍵人物。那麼，臺大歷史系跟中研院是什麼關係呢？

9 吳相湘，《三生有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增訂初版），頁 283-2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教授陣容而言，關係並不很深。傅斯年任校長後，曾經安排了一些史語所的學者與臺大合聘，以強化臺大的師資陣容。當時史語所在桃園楊梅，這些合聘人員就遷離楊梅，搬到臺北市溫州街、青田街一帶的臺大宿舍。臺大文學院與史語所的合聘教授，中文系有兩位：董同龢（1911-1963）、王叔岷（1914-2008）；歷史系則有五位：李濟（1896-1979）、董作賓（1895-1963）、芮逸夫（1899-1991）、凌純聲（1902-1981）、勞榦（1907-2003）。不過，1950 年文學院增設考古人類學系後，歷史系僅賸勞榦一位，他於 1959 年赴美任教，加上前此曾出國兩年，實際在系只有八年。[10]換言之，歷史系的大陸來臺教授，是以原在大學任教的學者為主。如果傅斯年不早逝，局面或許會稍有不同。[11]

再來，就領域而言，大陸來臺學者中，外國史的比例很高。在本文所含括的 12 位教授中，有 5 位的專門是外國史：徐子明、沈剛伯、劉崇鋐、張貴永（致遠）為西洋史，余又蓀為日本史。在二十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初興的時候，幾個最主要大學的歷史系都很注意領域的均衡，除了中國史，也重視西洋史，也有日本史、亞洲史的課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都是如此。但在實際的學術發展上，強烈偏向中國史——特別是近代以前的中國史。這其中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當

10 上述歷史系人事狀況，可見夏德儀遺作，〈執教臺大歷史系的回憶〉，《傳記文學》第 95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臺北），頁 120-125。《漢學研究通訊》載有勞榦的訪問錄，介紹部分說，他在臺大任教至 1972 年，是錯誤的。見邢義田，〈勞榦院士〉，《漢學研究通訊》第 2 卷第 2 期（1983，臺北），頁 91。史語所人員任教中文系之事，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頁 14；王叔岷，《慕廬憶往》（臺北：華正書局，1993），頁 72。

11 顯然為了加強與臺大歷史系的關係，中研院史語所於 1955 年聘請四位系中教授為通信研究員：沈剛伯、李宗侗、劉崇鋐、姚從吾。其中可能以姚從吾和史語所關係較密切，據說他每週都有一、兩天到南港中研院做研究。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記編輯小組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26；李守孔，〈永憶從吾師〉，《中原文獻》第 21 卷第 4 期（1989 年 10 月，臺北），頁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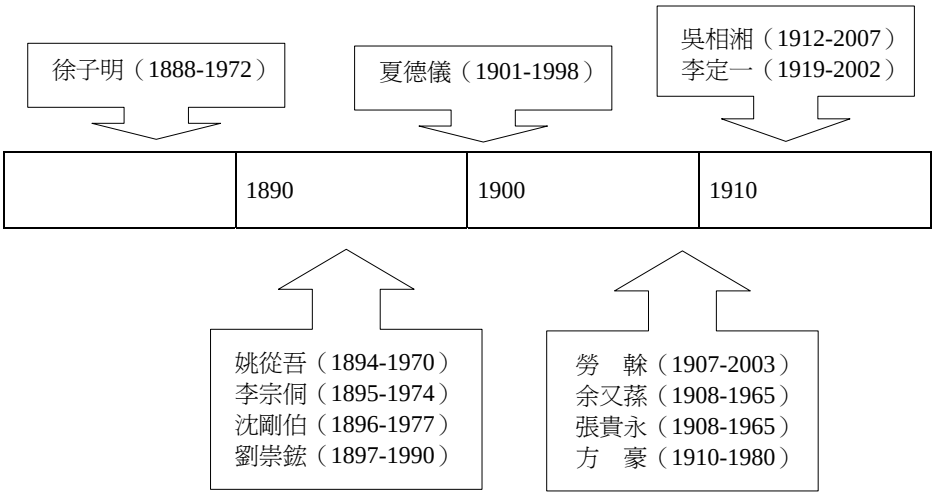
時學術資源貧乏，沒有外國史的史料，有關領域的學者難以進行研究，因此常有外國史專家轉而研究中國史，最有名的就是清華大學的雷海宗（1902-1962）和燕京大學的齊思和（1907-1980）。另外一個原因則跟學術的主流風氣有關，這從北大史學系看得最清楚。在 1920 年代，北大史學系的領導人是朱希祖（1879-1944），他強調歷史教學的全面與均衡。但 1930 年底朱希祖離職後，該系變成由傅斯年掌控。當時中研院史語所遷到北平，傅斯年雖然只在北大史學系兼任，校長蔣夢麟（1886-1964）、文學院院長胡適凡事徵詢他的意見，系主任陳受頤（1899-1977）也聽他的，即使 1933 年史語所開始南遷，傅斯年仍然居家北平，直到 1936 年初。傅斯年的學術觀念是追求專門、精深，北大史學系因此變成具有強烈研究導向的機構，在此情況下，只能中國史獨大了。（世界史課程並未減少，惟取消社會科學必修課。）[12]臺大歷史系大陸來臺教授有如此高比例的外國史學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現代中國早期歷史學界的情狀，也就是，出國唸外國史的人相當多，這跟戰後臺灣與 1980 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很不一樣。但另一方面，外國史學者當中比較積極從事研究寫作的，會變成以中國史為主。

也許有人想問，這些臺大歷史系早期教授的學術地位如何？可以說，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本來都出身菁英大學，在菁英大學任教，水準相當整齊，而且有幾位的學術業績或風格頗具重要性。但以 1950 年代左右的中國歷史學界而言，並沒有真正的領袖人物進入該系。接下來要一一介紹這 12 位教授，雖然只是簡單的敘寫，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應該有助於具體展示他們所帶來的學術傳統。在個別介紹之後，我要討論這個群體所透露的研究門徑問題。

12 尚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變革〉，《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北京），頁 116-120、127-130；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2004），頁 67-73、155；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9），第二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臺大歷史系大陸來臺學者（Ⅱ）



我以年齡大小為序來作介紹。

1. 徐子明（光，1888-1972）。徐先生是江蘇宜興人，出身當地世家，戊戌變法期間擔任禮部侍郎的徐致靖（1844-1918）就是他的叔父。他十一歲時已經讀畢五經，但家中送他接受西學教育。他於 1908 年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就學，大學畢業後，轉赴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歐洲中古史，1913 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最先任教於北京大學，傅斯年曾修過他的德文課。在思想意態上，他堅持以傳統士大夫文化為本位，所交往的都是同類人物，如辜鴻銘（1857-1928）、林紓（1852-1924）、黃侃（1886-1935）。五四反傳統運動興起時，他曾著書批判。他於 1929 年轉任中央大學教授，除抗戰時期，大都任職於此，前後將近十年，是典型的南派學者。吳相湘在論及歷史系中的南北區分時，沒提到他，可能跟他在系裡的邊緣地位有關。徐子明在系期間，最有名的事就是攻擊胡適，他撰有《胡適與國運》、《胡禍叢談》，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導致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秩序崩潰與共產黨興起的原因。《胡適與國運》在 1950 年代末期的臺灣曾經掀起波瀾，但這種立場在系內是無法獲得同情的。徐子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在大學任教五十多年，並未從事學術研究或撰述，他寫過一些中、英文文章，身後由家人編成《宜興徐子明先生遺稿》。[13]

2. 姚從吾（1894-1970）。在大陸來臺教授中，他大概是原本在中國史學界最居中心位置的一位。姚從吾為河南襄城人，出身當地望族，但有清一代，這一族並沒有出過任何重要人物，無法跟江南望族相比。姚從吾是北京大學史學門的首屆學生，1920 年畢業，當時名叫姚士鰲。他比傅斯年大兩歲，比傅晚一年畢業，跟顧頡剛同屆，大學畢業後，還在北大唸了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姚從吾學術養成的最大特色是長期留學。他於 1923 年到德國留學，求學、任教達十一年，1934 年才回國，到北大任教，出國時間如此之長，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姚從吾跟傅斯年關係相當密切，他們不但在北大同學，在德國也有相處的機會，他回國任教，也出於傅斯年的催促。姚從吾在 1936 年出任北大史學系系主任，長期擔任這項職務，是標準的北大派。姚從吾的專長為蒙古史、遼金元史，是遼金元史領域的重要開創者。在治學風格上，他屬於典型的史料考證派，不但親身實踐，也長期在各大學開設史學方法論的課，講述德國主流的史料批判學說。除了積極從事研究、教學，他跟政治也有相當的關係，是國民黨在學界中的一個支柱。[14]

3. 李宗侗（1895-1974）。李先生字玄伯，也常以字行，河北高陽人，出身高門，號稱高陽李氏。他的同支異房先祖李霨（1625-1684），在清初曾經擔任過二十六年的內閣大學士。李霨於順治三年（1646）中進士，這是滿人入關後的第一次會試，該科狀元名叫傅以漸（1609-1665），就是傅斯年的七世祖，也當到大學士。李宗侗的祖父是晚清清流派領袖李鴻藻（1820-1897），父親李焜瀛在清末曾任郵傳部侍郎，他的母親族出南皮張氏，也就是張之洞（1837-1909）這一家族。李宗侗於 1912 年留

13 汪榮祖，〈徐子明先生之生平與學術〉，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2；以下簡稱《系史》），頁 15-23；〈徐子明先生傳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1996），第 15 輯，頁 290-292。

14 姚從吾生平資料甚多，略見王德毅，〈姚從吾教授傳記〉，收入《系史》，頁 25-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法國，從中學唸起，1916 年進入巴黎大學（Sorbonne），先學化學，後來改攻西洋古代史，1924 年歸國。回國後，他先在北京大學法文系任教，之後擔任中法大學教務長，這所大學是他的叔父、國民黨元老李石曾（1881-1973）所創辦，校長是蔡元培（1868-1940）。李宗侗回國後，治學範圍改為中國古代史，研究門徑很有特色，可是他的遭遇非常不幸。國民黨北伐成功後次年，1929 年，李石曾出任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宗侗的岳父易培基（1880-1937）為首屆院長，李宗侗因而出任故宮秘書長。1932 年故宮的領導階層被人控告盜賣故宮寶物，以贋品充數，這是轟動一時的大案。此案在 1934 年遭到檢察官起訴，被告人中李宗侗名列第二，在易培基之後，後來因為中日戰爭爆發，不了了之，沒有判決。一切跡象顯示，這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冤案，跟政治鬥爭、私人恩怨有關。[15]李宗侗的事業和名譽卻因此遭到極大的打擊。他在案發後隱居上海租界，中日戰爭期間繼續以化名匿居上海，但是代中央圖書館保藏該館帶不走的善本書，於戰後歸還。李宗侗於 1948 年應聘來臺大歷史系任教。在系期間，除了研治古代史，還因家世淵源，熟悉清朝掌故，兼治清史，並且指導學生進行有關的研究。[16]

15 有關此案的記述和討論文字甚多，較新的綜述可見鄭欣淼，〈由《魯迅全集》的一條注釋談故宮「盜寶案」〉，《魯迅研究月刊》2007 年第 9 期（北京），頁 49-57；劉立勇、朱與墨，〈故宮盜寶案真相與易、蕭蒙冤之白〉，《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 年第 4 期（長沙），頁 35-37。

16 從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李宗侗在《傳記文學》發表一系列回憶文字，這是關於他的生平的最可靠資料。可惜的是，這批文章內容不完整，沒有他在法國學習文史的任何紀錄。本段所述，參考陳捷先，〈飽學、謙和、仁厚的李宗侗先生〉，《系史》，頁 35-48，以及李氏以下作品：〈旅法雜憶〉（共四篇），分見《傳記文學》第 1 卷第 3 期（1962 年 8 月，臺北）、第 6 卷第 2 期（1965 年 2 月，臺北）、第 6 卷第 3 期（1965 年 3 月，臺北）、第 6 卷第 4 期（1965 年 4 月，臺北）；〈我的先世與外家〉，分見《傳記文學》第 5 卷第 3 期（1964 年 9 月，臺北）、第 5 卷第 4 期（1964 年 10 月，臺北）；〈回國任教及祖母病逝〉，《傳記文學》第 9 卷第 3 期（1966 年 9 月，臺北）；〈北大教書及辦猛進雜誌〉，《傳記文學》第 9 卷第 4 期（1966 年 10 月，臺北）。李先生在法攻讀西洋古代史一事，見馬漢寶，〈崇敬玄伯叔的學問——擇記往事二則〉，收入不著編者，《李玄伯先生哀思錄》（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沈剛伯（1896-1977）。沈剛伯是戰後臺大文學院的樞紐人物，從1948 到 1969 年，連續二十一年擔任院長。他是湖北宜昌人，家世如何，並不很清楚，應該也不錯。他小時候父親在日本留學，由祖父教導，受到最嚴格的菁英式古典教育。他在 1917 年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24 年考取湖北省官費，到英國倫敦大學深造，攻讀埃及學和英國史，1927 年返國，基本上在南方的大學任教，尤其長期任教於中央大學。就機構歸屬來說，沈剛伯應該是典型的南派，不過，他的性情思想跟央大許多同事格格不入，在文化意識上，毋寧較接近北派，他與北派的一些領導人也有一定的交情。事實上，中日戰爭結束後，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代理胡適）一直要把沈剛伯聘到北大歷史系，連聘書都發了，沈剛伯終究沒有去，最後在 1948 年來臺大接任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是被莊長恭校長聘來的，莊長恭大力改革，解聘了很多教師，但不堪重荷，不到半年就求去，返回大陸。當時局勢很亂，沈剛伯向教育部建議請傅斯年來收拾局面，開啟了傅、沈為期兩年的合作。在大陸時期，沈剛伯可能是聲譽最高的西洋史教授，他以學貫中西、見解超卓知名。和許多西洋史教授一樣，他沒什麼著作，但以口碑建立了很高的名聲，這在現代中國史學界是個異數。來到臺灣以後，他憑藉早有的經史功力，發表了一些關於中國史（特別是古代文化思想）的論著，也為文表達自己的史學見解。[17]

5. 劉崇鋐（1897-1990）。劉崇鋐是福建閩侯人，和李宗侗一樣，出身顯赫門第。福州有幾個世家，長期彼此通婚，劉家亦是其一。劉崇鋐的祖父是林則徐（1785-1850）的女婿，他自己的夫人是沈葆楨（1820-1879）的孫女，也是他的表姊；中國近代史研究名家劉廣京（1921-2006）、臺大化學系退休教授劉廣定都是他的姪孫。劉崇鋐早年就讀清

17 參考沈剛伯，〈我幼時所受的教育〉，收入氏著，中央日報編，《沈剛伯先生文集》（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下集，頁 763-773；蔣復璁，〈我與剛伯先生〉，《中外雜誌》第 23 卷第 6 期（1978 年 6 月，臺北），頁 132；杜正勝，〈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收入氏著，《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157-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學堂，1918 年赴美國留學，插班威斯康辛大學三年級，研習西洋史，畢業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碩士，之後至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繼續研究歐洲史與美國史。他在 1923 年回國，先任教於南開大學歷史系，1925 年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一直到 1949 年來臺灣（其間經過西南聯大的階段）。劉崇鋐也是西洋史的名師，擔任過許多行政職務，但沒有學術著作。[18]

以上介紹的是早期教授中的第一代現代中國歷史學者，他們幾乎全都出身世家。不知是否為巧合，還是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一個社會文化現象？

6. 夏德儀（1901-1998）。夏德儀是江蘇東臺人，東臺縣在蘇北，但離長江不太遠。他於 192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主要在中學任教，1941 年擔任昆明中法大學文史系講師，是任教大學的開端，時年四十。第二年，夏德儀轉任四川江津白沙鎮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副教授，跟臺靜農（1902-1990）同事，1946 年，他和臺靜農獲得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1901-1980）的推薦，前來臺大文學院任教，是最早到歷史系的大陸籍教授。魏建功原來也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任教，與臺靜農都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年輕健將，有左派色彩，夏德儀和他們關係深厚，思想意識也許有接近的地方。夏德儀的專長是明清史，他對臺灣的歷史學發展有些特殊的貢獻，後文會敘述。[19]

7. 勞榦（1907-2003）。勞榦是湖南長沙人，但家在陝西，高祖父是曾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1802-1867）。他在 1930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

18 蘇雲峰，〈劉崇鋐教授傳〉，收入《系史》，頁 59-77。

19 夏德儀的早期經歷與來臺因緣，見徐泓，〈夏德儀先生行誼〉，收入《系史》，頁 79-80；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收入黃清連編，《結網三編》，頁 335-336。魏建功與夏德儀是北大大學部同學，又是蘇北同鄉，他和臺靜農則為北大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同學，與兩者關係都密切。魏建功於 1948 年底離臺時，還把重要文物託夏德儀保管，數十年後歸還魏家。見曹達，〈魏建功年譜〉，《文教資料》1996 年第 5 期（南京），頁 4-10、14；魏至，〈關於魏建功手書《魯迅舊體詩存》及其他〉，《魯迅研究月刊》1998 年第 10 期（北京），頁 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系，畢業後進入中研院史語所，1949 年開始與臺大歷史系合聘。勞榦是現代中國第二代史學家中的佼佼者，對於秦漢史的研究有巨大貢獻，在上古史方面也很有造詣。他著作非常豐富，正式與非正式論文接近 200 篇，編著的書將近 20 本。他發表最後一篇正式論文時已經 89 歲。

8. 余又蓀（1908-1965）。余又蓀是四川涪陵人，1931 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史，也曾在各大學任教。1940 年代，他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務主任，1949 年跟傅斯年一起來臺大，任總務長，1950 年起專任歷史系教職。1965 年 4 月 27 日下午三點左右，於歷史系主任任內，在臺北市南昌街遭遇車禍身亡。在歷史學方面，余又蓀的專長是日本史和中日關係史。他寫過關於日本史、中日關係史、中國史的通論性書籍。[20]

9. 張貴永（1908-1965）。張貴永是浙江鄞縣人，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1929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1933 年獲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然後再赴英國研究。他從 1934 年起任教於中央大學，直到 1949 年來臺。在臺大任職期間，張貴永曾多次出國講學，1965 年 12 月擔任西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時，因為腦中風去世。張貴永的學術生涯有兩個特色。第一是，在臺大的西洋史學者當中，他是著述最豐富的一位，主要研究歐洲外交史。其次，張貴永雖然畢業於清華，在臺大諸教授中，以他南派色彩最為濃厚。在 1950、1960 年代的臺灣歷史學界，有兩位重要的南派人物。一位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創所所長郭廷以（1904-1975），他也在臺灣師範大學長期任教；另一位是曾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1901-1985），他後來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也就是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張貴永跟這兩位關係都很密切，在兩人主持的機構都有兼職，而且還是中研院近史所的創所合聘研究員，主持教務教案檔的整理工作。這個情況，在當時的臺大歷史系是個異數。張貴永與南派的密切關係，大概主要是基於機構背景、人際關係，或許也有文化意識的因素，但顯然

20 〈余又蓀先生事略〉，收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余故教授又蓀先生紀念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66），頁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跟學術觀點無關。張貴永是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的學生，尊崇德國主流的史料考訂思想，對這個學術傳統的精神史傾向也有了解。他曾以蘭克史學為題，寫文章紀念傅斯年。文中述及，抗戰時傅斯年曾告訴他，自己走的是蘭克學派的路線，可見傅氏對於外界對他的基本定位是同意的。[21]

10. 方豪（1910-1980）。方豪是浙江杭縣人，有名的自學出身的學者。他 12 歲時，被父親送入天主教修道院，走神職的人生道路，1935 年 26 歲時，晉升司鐸，即俗稱的神父。在修道院期間，方豪對中國文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私下蒐集學術刊物，閱讀名家論文，揣摩歷史研究的方法，並寫信向學者請益，尤其以陳垣為私淑對象。在晉升神父後的傳教期間，他結識了兩位南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浙江同鄉：張其昀和陳訓慈（1901-1991），開始發表論文。1938 年，他離開浙江到抗戰的大後方，終於在 1941 年正式進入學術界，到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浙江大學是南派的大本營，在那裡，他很受張蔭麟的影響。之後，他還曾在復旦大學、輔仁大學任教，1948 年底，方豪獲得胡適的推薦來臺大任教，次年就任。方豪著述極多，近代史家少有可比。他的領域為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早期以中西交通史，晚期以臺灣史為主。方豪進入學術界，雖然是受到南派領袖人物的援引，但他的治學完全遵循主流，是典型的史料考證派。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就學術門徑而言，南、北派之分有很多盲點。[22]

11. 吳相湘（1912-2007）。吳相湘是湖南常德人，出身商人家庭，做桐油生意，父親是中國近代史名家李劍農（1880-1963）的朋友。吳相湘於 1937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當時研究清史，師從孟森（1868-1937）。畢業後進入中研院史語所，但沒有跟隨史語所遷往昆明。他在

21 張貴永，〈蘭克的生平與著作〉，收入氏著，《張致遠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7），頁 124-145。此文原刊於《自由中國》第 7 卷第 12 期（1952 年 12 月，臺北）。至於張氏的史學觀，可見氏著，《史學講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22 方豪之生平與著述大要，見李東華編著，《方豪先生年譜》（臺北：國史館，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1 年從軍，到薛岳（1896-1998）負責的第九戰區編纂戰史，是少見的史家報國。戰後曾執教於蘭州大學、河南大學，1949 年來臺灣，1952 年進入臺大歷史系，1965 年辭職。在臺大歷史系早期教授中，吳相湘和另一位李定一是僅有的中國近代史學者。他勤於著述，勤於蒐集資料，經常出國訪問研究，在編印近代中國史料上也有很大的貢獻，為此還犯了忌諱，在 1962 年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吳相湘的作風是，對於工作環境有所不滿意，就先辭職，再做打算，他在臺大歷史系也是如此，很有湖南騾子的性格。[23]

12. 最後一位是李定一（1919-2002）。本文介紹的教授中，他最年輕，比年齡次輕的吳相湘還小七歲。李定一是四川銅梁人，1942 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中日戰爭結束後，他曾執教於湖北師範學院，爾後前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進修，1948 年轉往美國，從事報業工作，1949 年來臺灣，任教於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原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前身），1952 年應聘至臺大歷史系兼任教職，1955 年起改為專任，1963 年辭職赴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教。李氏在臺大期間，曾於 1956 年前往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進行研究訪問，為期兩年，故在系全職任教時間只有六年。李定一主攻中國近代史和中美外交史，治學特色是立意撰寫通史性著作，1953 年就出版了《中國近代史》，此外，他作研究注意西文資料，與美國學界頗有接觸。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力量迅速強大，1960 年代中後期起對臺灣歷史學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李氏可以算是初期影響的一個顯現。[24]

以上透過通性的說明與個別介紹，討論了大陸來臺教授們的學術特色，現在要從學術取徑的觀點，作一些歸納和討論。很明顯地，臺大歷史系從大陸來的教授幾乎全部都是現代史學事業的參與者，徐子明是唯

23 吳相湘，《三生有幸》，頁 287-294、362-365。

24 參見張力，〈李定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4 期（1987 年 9 月，臺北），頁 93-96；李定一，《中美外交史》（臺北：作者發行，1960），〈序〉，頁 2；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669-6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的例外。他雖然留學歐美，通數國語文，但看不出有任何關於史學建設的言論與行動，也許是傳統士大夫文化入骨太深了。

本文一開始，利用梁啟超和傅斯年的言論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傳統之內，人們對於歷史學該怎麼走，存在著不同的想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有著不同的願景。現代中國史學存在哪些路數，學者有不同的分類，我個人在這裡試圖提出一個四分法，也就是分為史料派、解釋派、史觀派、義理派。這四派其實代表四種基本觀點，彼此之間並不完全相互排斥，一個人很可能懷有一個以上的觀點，重要的學者尤其不易為單一關懷所拘束。但觀點間有主從的問題，當某人主要採取甲取徑，以其他為輔，他就算是甲派了。所謂史觀派，主要是指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這一派或者出於為革命找根據和方法，或者基於對馬克思理論的信仰，從歷史發展五階段論、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等角度來探討中國歷史。左派史學雖然從 1930 年代就開始活躍，但在 1950 年代以前，在學術界內並不佔重要地位。中共建國後，憑藉政治局勢的改易，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正統的學說。除了左派，雷海宗、林同濟（1906-1980）在 1940 年代初提出掀動一時視聽的文化週期論，以哲學觀點消化史實，論說當代中國奮鬥的意義，也可算是史觀派。至於義理派，講究在歷史中求教訓，藉以標舉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指示未來應有的走向，但和史觀派不同，此派比較重視具體史事，少談抽象的形態。學衡派（或史地學報派）柳詒徵（1880-1956）、繆鳳林（1899-1959）的史學觀就有義理派的意味。這一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無疑是錢穆，至少是 1930 年中期以後的錢穆。義理派有幾個值得一提之處，第一是注重通史寫作，這是很可理解的。探尋歷史的意義，很依賴長時期歷史過程所提供的大圖象，專題研究難有用武之地。[25]在傳統中國，從唐代中葉到宋元的義理史學（褒貶史學）強調編年體，貶抑紀傳體，也是這個道理。第二，義

25 參考鄭師渠，〈學衡派史學思想初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 年第 4 期（北京），頁 34-37；王汎森，〈錢穆與民國學風〉，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35-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派（以及部分史觀派）在中日戰爭時興盛了起來。敵人的侵略以及隨之而來的苦難，讓很多學者對於客觀知識的意義產生了深刻懷疑，這在以科學精神治史的人當中，也不例外。因為抗戰而大興的民族主義情緒，更使得歷史意義的表達有了著力點。[26]第三，義理派雖然有褒貶史學的傳統淵源，也有近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影響，但或許在更大的程度上，它還是現代中國思想環境的新生產物——一個在經典喪失神聖性後獲取意義的新手段。

很明顯地，上述派別的形成，受到史學和學術以外因素的深刻影響。這裡要特別強調，本文對中國現代史學的分派是以史學思想與實際研究取向為根據，而非學者個人的思想或心態。造就史觀派和義理派的力量，如唯物史觀、民族主義、愛國思想、儒家信仰，也普遍存在於其他派別的學者。反過來說，有不少史觀派和義理派的學者是文獻考證與史事解釋的出色當行。實際存在的，是學術與非學術因素混合的狀態，我的觀察，則是以學術方向為基準。

依照前文的分類，臺大歷史系早期教授之中，既沒有史觀派，也沒有義理派，最主要的陣營是史料考證派。明確表現出這個學術門徑的有：姚從吾、勞榦、方豪、夏德儀，此外，張貴永、吳相湘應該也在其列，雖然近代史的治學方式與較早期的歷史差別很大。史料派觀點最明確的代言人是姚從吾。姚氏從 1934 年回國開始，就開設歷史方法論的課，據說年年開，持續將近四十年，連擔任河南大學校長期間都有開課。他在課堂上，用一半以上的時間介紹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和班海穆（Ernst Bernheim, 1850-1942）的史學思想，《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一集就是這門課的後期講義。從內容看來，這份講義在 1970 年春姚氏去世前不久還修訂過，介紹了前一年剛出中譯本的卡爾（E. H. Carr, 1892-1982）《歷史論集》（即《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姚從吾推薦此書，反映他受到新思潮影響，對於歷史學的客觀性質逐漸

26 參見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442-4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所保留，他在講義中為歷史學所下的定義是，對「事變」做出「公正的說明與合理的解釋的學問」，好像也加入了研究者的主體因素。不過，除了導論部分，該講義完全集中於史料批評的問題，可見他所傳授的觀念並沒有重要改變。[27]現在要對現代中國的史料考證派作進一步的討論。

現代中國史學興起後的史料考證，並不限於諸如蒐集材料、分類辨析等工作。這個思想包含了很多新觀念，譬如史料擴大，史料不再限於史部的書籍，它們涵蓋一切的文獻，另外還包括實物、考古發現，乃至於田野調查的紀錄。而且，文獻歷史化了，文獻是歷史環境的產物，經典的觀念被排除。此外，現代史學注重史料價值的辨別，尤其強調直接與間接史料的嚴格區分，這是蘭克學派的精髓。如所周知，史料考證學派（有人稱為「新漢學」）的領袖是傅斯年。和姚從吾一樣，傅斯年也留學德國，但他為什麼回國後會在中山大學成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宣稱「史學即是史料學」，有著相當複雜的因素。相對來說，姚從吾就比較簡單，他在德國學歷史，服膺蘭克學派的治史思想，忠實傳達這一派的觀點——但並不包括蘭克以及德國史學家普遍抱持的所有歷史時代都具有神聖意義的信念。至於傅斯年，前面提過，他不是學歷史的，留學時也沒修過歷史課。他仔細讀過班海穆的《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教本》（*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889 初版），雖然藏書中沒有任何蘭克的著作，無疑曾受德國主流的史料批判觀念的影響。[28]但對他啟發更大的

27 陳捷先、札奇斯欽編，《姚從吾先生全集（一）——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71），以及杜維運所寫的〈後記〉（頁 77-85）。引文見該書頁 1。又，該書頁 6 提及，王任光教授所譯的《歷史論集》於 1968 年 10 月譯成，「去年春季出版」。根據《歷史論集》的版權頁資料，此書初版於 1968 年。對照姚氏的記述可以推測，該書實際出版時間為 1969 年春季。姚從吾去世於 1970 年 4 月 15 日，歷史方法論講義當修訂於此前不久。

28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2-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能是當時歐洲的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傅斯年之所以用歷史語言學的概念來呼應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是他認為，這是最能建立歷史真知的方法。他個人的奮鬥目標在於促成中國的現代化，他認為以科學為象徵的真理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客觀知識是建設中國的基礎。他心目中的科學就是自然科學，恐怕沒什麼社會科學的餘地。[29]傅斯年還有一個他人難及的動力，就是民族主義的激情，他想在最短的時間，在中國建立最高水準的中國研究，超越歐洲的東方學。

重大的學術運動背後往往有著思想的因素，這是為什麼這類運動能有強大動力的緣故，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就是這樣的情況。不過，當運動成功後，追隨者未必清楚了解運動的思想背景，經常只是根據行之有效的方法來工作。在現代中國，史料學派遭到許多批評，如瑣碎，跟社會脫節，能力較次的學者，甚至往往堆砌史料，連精密的實證研究都談不上，這就暴露了這個運動的弱點與限制——有時候，它真的只是「新漢學」，清代考據的現代版。在戰後初期的臺大歷史系，史料考證取向的學者居於主流，但他們已遠離這個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初興時的環境，他們——包括教授歷史方法論的姚從吾在內——基本上是實踐者，在理念論述的層次相對沉默。儘管如此，他們的教學和研究還是發揮了影響，在臺大與其他大學，史料派所帶來的學風構成臺灣歷史學的主要基盤，現在仍在起作用。

在現代中國史學傳統之內，還有一個觀點，我稱之為解釋派，最早提出「新史學」觀念的梁啟超也許就可歸為此派。我之所以注意到解釋派，跟我研究中古史有關。在個人看來，中古史領域的最重要創建者陳寅恪就是抱持解釋派的觀點，他重視史料，也從事精密的考證，但他的學術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辨識有意義的歷史現象，追尋其背後的機制。他永遠在問「為什麼」。受到陳寅恪的影響，中古史領域歷史解釋的風氣很盛，甚至可以說是主流——至少在魏晉南北朝的研究上是如

29 傅斯年西學藏書很豐富，範圍甚廣，但其中絕少政治、社會、經濟學的書。見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p. 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30]現代中國第二代史學家嚴耕望（1916-1996）精研秦漢史和中古史，他雖然推尊陳寅恪，但也不無微詞，在我看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嚴耕望治學屬於考證的門路，對陳寅恪的風格多少有隔閡之感。[31]

解釋派跟史料考證派有兩個重要差別。首先，解釋派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只在發掘正確的事實，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重要的歷史現象。這種了解是無法從個別的事實直接拼合起來的，而需要在事實認定之外的說明，乃至揣摩想像。其次，解釋派對於史料的價值估計比較低。相對於人類的實際經驗，我們能夠找到的史料不但數量極微少，而且不可靠，充滿寫作者的主觀。張蔭麟有一篇文章就專談史料的限制。因此，要研究歷史，還須跳脫史料所必然帶有的陷阱。[32]

早期現代中國史學界的解釋派有兩種形態，一種不太注意社會科學的理論，另一種則重視社會科學。陳寅恪屬於前者，至於後者，清華大學的蔣廷黻、北京大學的朱希祖都有這個傾向。朱希祖是章太炎（1869-1936）的學生，年紀比 1890 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現代史學家大很多，他的著作中看不出社會科學的痕跡，但他 1920 年代主持北大史學系時，在課程安排上非常重視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是低年級必修課，他也明白講出這個理念。朱希祖推崇蘭普雷茨（Karl Lamprecht, 1856-1915），蘭普雷茨主張科際研究法，重視文化史、生活史，這在德國剛好是與蘭克史學對立的理念。[33]在民國早期，歷史學界最講究社會

30 參見陳弱水，〈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27-65。

31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27-29；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85-86。另參見宋德熹等，〈忘情於「不古不今之學」——訪嚴耕望教授談中國中古史研究〉，收入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頁 618-619。

32 張蔭麟，〈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收入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頁 1059-1086。

33 尚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變革〉，頁 121-125；〈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科學的大概是一批留法的學者，他們包括曾經任教北京大學的青年黨領袖李璜（1895-1992）、[34]古史名家徐旭生（炳昶，1888-1976），另一位就是戰後任教於臺大歷史系的李宗侗。李宗侗於 1930 年代隱居上海時，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新研》，此書利用民族學、社會學、比較歷史的方法解釋古代中國的一些現象，很得好評，被認為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35]他來到臺灣後，修改增訂此書，更名為《中國古代社會史》，重新出版。李氏直到晚年，一直維持重視社會科學的傾向。舉例而言，他研究中國古代的社祭，覺得臺灣的土地公可能是中國古代社神的流衍，遂於 1962 年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長劉枝萬（後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協助下，調查了臺北市 23 座土地廟，並取得劉先生的南投宗教調查資料，比對古代社祭與臺灣土地廟的特點，寫成〈社祭演變考略——臺灣土地廟的調查研究〉一文發表。按現在的觀念，這就接近歷史人類學的取向了。[36]此外，他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論文題為：〈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動〉，明顯出於社會學的問題意識。[37]

李宗侗對社會科學的敏感，在同輩史家中是少見的，何以同為留法的徐旭生、李璜都有類似的傾向呢？關於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蒐集這

指導書〉，收入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1125-1127。關於蘭普雷茨史學思想的特色以及他在德國學界的位置，見 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ised edition;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97-200; Georg G. Iggers, "The Historian Banished: Karl Lamprecht in Imperial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7, no. 1 (1994), pp. 87-92.

34 李璜於 1928 年就出版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上海：東南書店，1928）。

35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北京：來薰閣書店，1941 初版；上海：開明書店，1948 再版）。

36 該文見李玄伯，〈社祭演變考略——臺灣土地廟的調查研究〉，《大陸雜誌》第 26 卷第 10 期（1963 年 5 月，臺北），頁 1-5。劉枝萬協助調查之事，見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頁 148-150。

37 李宗侗，〈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22 期（1973 年 6 月，臺北），頁 263-3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位先生的資料，才可能獲得比較確切的掌握。以下是幾點暫時的推測。首先，法國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一個重要起源地，法國歷史研究專業化的開展雖較德國為遲，但有堅強的社會史與比較史傳統，不同於德國史學以「國家」為核心關懷，特重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在專業史學初興的十九世紀後期，法國頂尖的歷史學家無疑是古朗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對古朗士而言，歷史學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過去的事件，它的根本對象應該是社會的機能，人類的全體存在。簡言之，歷史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科學，古氏對長期現象與制度的興趣遠遠大於古人自己關注的個別事件。就某種意義而言，古朗士也是現代社會學的先驅，事實上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就是他的學生。李宗侗曾翻譯古朗士的名著《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中文譯名為《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受到這個傳統的深刻薰染，不言可喻。[38]

其次，在二十世紀初，也就是李宗侗等人留學的時候，就研究方法而言，除了史料批判，法國歷史學還出現了參考社會科學的傾向，歷史學與地理學關係尤其密切。相較之下，德國史學主要與語言文字學（philology）結合。關於二十世紀初法國史學的科際研究取向，最具突破意義的發展可能是《歷史綜合評論》（*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的發行。這份刊物的創辦人兼主編貝爾（Henri Berr, 1863-1954）不是專業歷史學家，甚至不曾在大學任教，他是高中的修辭學教師，學術背景主要是哲學。貝爾對歷史研究懷有特殊的想法，除了撰書著文，他在 1900

38 以上所述，參見 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 by Arnold M. Pome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4-235, 242-246; Geor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U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8), pp. 121-125;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first published in 1913), chaps. 6-8. 按，古朗士的姓為 Fustel de Coulanges，簡稱應作 Fustel 而非 Coulanges，此處依李宗侗的譯名。李氏長期就讀於法國的中學、大學，不可能不了解這個問題，他取「古朗士」之名，應是為了取便中國讀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創辦《歷史綜合評論》以實踐理想，該刊很快成為重要的學報，對於新生代歷史學者尤其有影響。貝爾把歷史研究區分為「博學的綜合」和「科學的綜合」兩種形態，前者重建史實，後者則解釋過往的世界。「博學的綜合」固然有其價值與必要性，「科學的綜合」才是進入人類生活底蘊的路徑。貝爾認為，要成就後者，歷史學必須向其他學科開放，《歷史綜合評論》以科際整合為號召，也邀請重要的社會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撰文。貝爾在法國歷史學界多少是個邊緣人物，但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他是年鑑學派的直接先驅。[39]

第三點則要回歸中國第一代現代史學家的特色。嚴格來說，徐旭生、李璜、李宗侗三人都不是學歷史的。徐旭生在巴黎大學學哲學，回國之初曾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在當時法國的學院建制，社會學屬於哲學學門，徐氏有可能受到社會學的影響，他也研讀過若干法國歷史學方法論的著作。李璜在法國獲得國家文科碩士學位，他考的三個學科分別為歷史學、社會學和教育學（教育社會學），論文則採比較宗教學的取向。[40] 李宗侗修習文科的情況不詳，據說攻讀西洋古代史，但從回國後任教法文系看來，大概也不是純學歷史。這裡想表達的看法是，徐氏等人幼少接受傳統的經史教育，徐旭生與李宗侗根底尤深，到法國後既非專攻歷史，又處於科際交錯、地理學和社會學興盛的環境，回國後徐旭生和李宗侗改治中國古代史（李璜從政），企圖借重其他學科的觀念探查深層現象，固其宜也。這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史學中解釋派的法國源頭。

---

39 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pp. 278, 304-308, 322-325, 336-337, 339-341; William R. Keylo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p. 8.

40 就目前所見，徐旭生的生平資料甚零散，本段所述參考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3），〈敘言〉，頁 1-2；李宗侗，〈旅法雜憶〉（三），《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3 期（1965 年 3 月，臺北），頁 50；程安，〈徐旭生〉，《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3 期（南陽），頁 121。李璜的部分見氏著，《學鈍室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第三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臺大歷史系，還有一位教授強調歷史解釋但不留意社會科學，這就是沈剛伯。沈剛伯一方面指出，史料無論如何蒐集，都是殘缺而充滿主觀的，歷史學不可能發展成精確的科學；另一方面，歷史研究所追求了解的，應當是在某種意義上有生命的過去。要重建活的過去，當然須對史事有所解釋，有所體會。解釋史事，則要有根據，如果根據不是社會科學發展出來的看法或律則，那是什麼呢？沈剛伯認為，最主要的是「時代精神」，也就是說，用「時代精神」來了解個別事象。他表示，「時代精神」可以理解為「每一時期的特殊潮流」，「它是支配當時一切的動力，貫串一切的線索。有了這種線索，對每一時代所有的史實，便可左右逢源，迎刃而解，容易明白。」如何而能辨識出這種精神呢？沈剛伯說明如下：

> 時代精神，不是先設假定，再演繹到各種史實上邊去的；乃是先將某一時代的重大事件，很客觀地一一分析其因果，到分之無可再分，析之不能更析的地步，就假定它為一種因素，然後把它反回頭去用到原來的事件上，看它是否信而有徵，這就像做數學題目，反證得數，看它能否還原一樣，若能還原，這假定方能成立。如此一一研究分析，慢慢地積累歸納，纔求出來所謂時代的精神。這絕非主觀的假定，也不是偶合的孤證，更不是教條式的史觀。[41]

沈氏「時代精神」一詞雖然取自德文的 Zeitgeist，但完全沒有神秘的意味，它指的是具體的時代整體形勢。這樣的解釋原理，很像詮釋學理論（hermeneutics）所說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由部分來掌握全體，再透過全體了解部分，形成認識的增長。從研究實務的觀點看來，沈剛伯設想的重建「時代精神」的方式有理想化之嫌，很難做到，但他提出的解釋方式則是有可行性的。沈剛伯是大陸來臺教授中史學思想最活躍的一位。除了標舉解釋的理念，他也肯定考證的必要，強調歷

41 以上引文見沈剛伯，〈如何學歷史〉，收入氏著，《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頁 552-553。「時代精神」的概念又見〈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方針〉，《沈剛伯先生文集》，上集，頁 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的鑒戒作用、史學與時代的關聯，但他不同意以考證來界定史學，尤其堅決反對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就中國現代史學的格局而言，這種議論明顯是針對史料派和史觀派而發出的。[42]他的史學思想可能最清楚表達於〈湯恩比的歷史哲學〉一文的結語，雖然這段話的重點在批評哲學性的歷史觀：

> 像我這樣鈍根甚深的人始終相信歷史是脫離不了事實的學問，我們只應該考證事實，進而探討每一事實本身的意義，同若干事實間的意義；至若湯恩比所說的事實背後的意義（The Meaning Behind The Facts），實屬神學同哲學的範疇，不是研究史學的人所宜過問的。[43]

沈剛伯明白宣稱，他崇尚的史學目標是司馬遷所說的「成一家之言」，意思是：建立一個有啟發性的獨特學說，但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歷百世而不易。[44]

在結束本文之前，想再介紹一位先生的業績，這就是夏德儀。前文已說過，夏德儀進入大學任教相當晚，他雖然年紀甚長，學術生涯卻大多在臺大度過。夏德儀是一位服務型的學者，他最主要的學術工作是參與《臺灣文獻叢刊》的編纂點校。《臺灣文獻叢刊》共計 309 種，595 冊，是臺灣史研究的一項重大基礎工程。這套叢書可說是臺灣學術史上的奇蹟，很值得表彰。主持《臺灣文獻叢刊》編印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並非學術機構，臺灣史研究也不在該單位的職責範圍，這項工作完全是研究室負責人周憲文（1908-1989）頂著「浪費公帑」的責難，主動籌畫，和少數夥伴所戮力成就的。[45]參與者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夏德儀。夏德

---

42 沈剛伯的史學議論見於以下諸文：〈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古代中西的史學及其異同〉、〈史學與世變〉、〈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方針〉、〈湯恩比的歷史哲學〉、〈如何鼓勵青年從事本國古代史之研究〉、〈讀史與修身〉、〈如何學歷史〉、〈歷史教育的推廣和簡易的參考資料〉，皆收入氏著，《沈剛伯先生文集》。

43 沈剛伯，〈湯恩比的歷史哲學〉，收入氏著，《沈剛伯先生文集》，上集，頁 220。

44 見沈剛伯，〈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收入氏著，《沈剛伯先生文集》，上集，頁 40；〈古代中西的史學及其異同〉，《沈剛伯先生文集》，上集，頁 48-49。

45 周憲文，〈匆匆二十四年〉，收入氏著，《稻粱集》（臺北：作者發行，1972），頁 2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儀從 1957 年開始加入叢刊的編纂事業，一直做到 1965 年，整整一百個月。他一共點校了 82 種，145 冊，約當全套叢刊的四分之一，前 50 種更絕大多數由他所點校，是這套叢書啟動的關鍵人物。在他所點校的文獻中，有 14 種並非成書，而是從各種資料中蒐羅與臺灣史事專題有關者，編輯而成。他還為他點校的文獻寫了 57 篇的序跋。我想，我們可以公平地說，這樣的工作紮實有效益，對學術的貢獻大過許許多多的論文。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史料考證學派的優點，警惕我們少做華而不實的事。另外值得提出，夏先生做這件事，並不只是為稻粱謀，他在 1993 年，92 歲的時候，還特別寫一篇文章，重提往事，批評中研院史語所，在《臺灣文獻叢刊》編纂之際，不讓他們主動協助整理明清檔案，抄錄其中有關臺灣的資料，憤懣之情猶在，可見他的高度學術熱誠。[46]此外，夏先生似乎也感受到臺灣史的工作有特別的意義。他當時點校、寫序跋都沒有具名，後來解釋說：「予不欲當臺灣史專家，招來無聊之攻訐。」可見這項工作有一定的敏感性。[47]

在早期臺大教授中，投身臺灣史工作的，夏德儀之外，還有方豪。方豪進行臺灣史研究不是偶然的，他是浙江人，在大陸時期，就對浙江史地有所考論，剛一到臺灣，立刻研究臺灣史，1949 年發表的五篇文章，全部都是關於臺灣史的。在近現代中國的史學意識中，鄉土史、地方史佔有怎樣的位置，看來是個值得探索的課題。

本文已經對臺大歷史系大陸來臺教授和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做了一

46 關於夏德儀參與《臺灣文獻叢刊》工作的情況，見氏著，《臺灣文獻箋證》（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作者自序〉、〈百吉參與《臺灣文獻叢刊》編纂工作一覽表〉、〈跋〈百吉參與《臺灣文獻叢刊》編纂工作一覽表〉〉。此書原題《百吉臺灣文獻叢刊序跋選錄》，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所改之名不妥，因為這本書並非箋證；「百吉」則為夏德儀寫序跋所用的筆名。又，夏德儀誤記該叢刊共出 565 冊，應為 595 冊。至於他晚年批評史語所之事，見氏著，〈再跋〈一覽表〉〉，收入氏著，《臺灣文獻箋證》，頁 181-182。他似乎對當時所長李濟特別不諒解。

47 夏德儀，〈跋〈百吉參與《臺灣文獻叢刊》編纂工作一覽表〉〉，收入氏著，《臺灣文獻箋證》，頁 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大體的回顧。很明顯地，他們帶來了現代中國史學傳統中的兩個主要因子，以史料考證派為主，解釋派為從。這些因子已經脫離原有的環境和社群網絡，勉強重新組合，力量恐怕大不如前。至於大陸來臺教授的學術觀點和研究門徑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還有待仔細衡量。現在可以說的是，自從 1960、1970 年代社會科學治史的觀念從美國重新引入後，臺灣史學界可謂「八方風雨會蓬萊」，除了馬克思主義，什麼潮流都來了，變得非常複雜，義理派也有相當的勢力，譬如錢穆的著作學說就頗具影響。這種情勢從好處來說，是多元豐富，就缺點而言，則為沒有主流，標準不明，對於新進學者的訓練、研究的評估，都有負面的作用，而且學術研究的課題往往隨風移轉，成果不容易累積。此一局面好像到現在還沒有改變，我們只好繼續掙扎前進。

*筆者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以本文之題發表 80 週年系慶演講，本文即根據當時的講稿修改而成。承蒙甘懷真主任邀請演講，陳建守先生協助蒐集資料並代製表，謹此深致謝意。又，本文投稿後，一位匿名審查人建議就現代中國歷史解釋觀念的法國源頭問題進行討論，本文對此作了補充，使論述結構更為完整，在此一併致謝。

（責任編輯：吳國聖　校對：蕭世偉　邱柏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余又蓀先生事略〉，收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余故教授又蓀先生紀念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66。

〈徐子明先生傳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15 輯。臺北：國史館，1996。

〈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收入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記編輯小組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王汎森，〈錢穆與民國學風〉，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

王叔岷，《慕廬憶往》。臺北：華正書局，1993。

王德毅，〈姚從吾教授傳記〉，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2。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

吳相湘，《三生有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增訂初版。

宋德熹等，〈忘情於「不古不今之學」——訪嚴耕望教授談中國中古史研究〉，收入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

李　璜，《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上海：東南書店，1928。

李　璜，《學鈍室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

李守孔，〈永憶從吾師〉，《中原文獻》第 21 卷第 4 期，1989 年 10 月，臺北。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北京：來薰閣書店，1941 初版；上海：開明書店，，1948 再版。

李宗侗，〈旅法雜憶〉（共四篇），《傳記文學》第 1 卷第 3 期，1962 年 8 月；第 6 卷第 2 期，1965 年 2 月；第 6 卷第 3 期，1965 年 3 月；第 6 卷第 4 期，1965 年 4 月，臺北。

李玄伯（宗侗），〈社祭演變考略——臺灣土地廟的調查研究〉，《大陸雜誌》第 26 卷第 10 期，1963 年 5 月，臺北。

李宗侗，〈我的先世與外家〉，《傳記文學》第 5 卷第 3 期，1964 年 9 月；第 5 卷第 4 期，1964 年 10 月，臺北。

李宗侗，〈回國任教及祖母病逝〉，《傳記文學》第 9 卷第 3 期，1966 年 9 月，臺北。

李宗侗，〈北大教書及辦猛進雜誌〉，《傳記文學》第 9 卷第 4 期，1966 年 10 月，臺北。

李宗侗，〈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22 期，1973 年 6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臺北：作者發行，1960。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李東華編著，《方豪先生年譜》。臺北：國史館，2001。
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1928-1960）〉，收入黃清連編，《結網三編》。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杜正勝，〈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收入氏著，《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
沈剛伯，〈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古代中西的史學及其異同〉、〈史學與世變〉、〈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方針〉、〈湯恩比的歷史哲學〉、〈如何鼓勵青年從事本國古代史之研究〉、〈讀史與修身〉、〈如何學歷史〉、〈歷史教育的推廣和簡易的參考資料〉、〈我幼時所受的教育〉，俱收入氏著，中央日報編，《沈剛伯先生文集》。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
汪榮祖，〈徐子明先生之生平與學術〉，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
邢義田採訪，〈勞榦院士〉，《漢學研究通訊》第 2 卷第 2 期，1983 年 4 月，臺北。
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
周佳榮，〈陳荊和及其東亞史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2005 年第 3 期，香港。
周憲文，〈匆匆二十四年〉，收入氏著，《稻粱集》。臺北：作者發行，1972。
尚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變革〉，《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北京。
尚小明，〈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學術關係〉，《史學月刊》2006 年第 7 期，鄭州。
胡 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新思潮的意義〉，俱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胡 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俱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3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夏德儀，〈作者自序〉、〈百吉參與《臺灣文獻叢刊》編纂工作一覽表〉、〈跋〈百吉參與《臺灣文獻叢刊》編纂工作一覽表〉〉、〈再跋〈一覽表〉〉，俱收入氏著，《臺灣文獻箋證》。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
夏德儀遺作，〈執教臺大歷史系的回憶〉，《傳記文學》第 95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臺北。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3。
徐 泓，〈夏德儀先生行誼〉，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
馬漢寶，〈崇敬玄伯叔的學問——擇記往事二則〉，收入不著編者，《李玄伯先生哀思錄》。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1）》。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
張　力，〈李定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4 期，1987 年 9 月，臺北。
張貴永，《史學講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張貴永，〈蘭克的生平與著作〉，收入氏著，《張致遠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7。
張蔭麟，〈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收入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曹　達，〈魏建功年譜〉，《文教資料》1996 年第 5 期，南京。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第 3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臺三版。
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第 4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臺三版。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
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9。
陳弱水，〈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
陳捷先、札奇斯欽編，《姚從吾先生全集（一）——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71。
陳捷先，〈飽學、謙和、仁厚的李宗侗先生〉，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入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第 2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第 4 冊。
程　安，〈徐旭生〉，《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3 期，南陽。
愛德華・哈萊特・卡爾（Edward H. Carr）原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0。
蔣復璁，〈我與剛伯先生〉，《中外雜誌》第 23 卷第 6 期，1978 年 6 月，臺北。
鄭師渠，〈學衡派史學思想初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 年第 4 期，北京。
魏　至，〈關於魏建功手書《魯迅舊體詩存》及其他〉，《魯迅研究月刊》1998 年第 10 期，北京。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蘇雲峰，〈劉崇鋐教授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歷史學系系史》。

Boer, Pim den.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lated by Arnold M. Pome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Gooch, G. P.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first published in 1913.

Iggers, Georg G.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ised edition;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Iggers, Georg G. "The Historian Banished: Karl Lamprecht in Imperial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7, no. 1, 1994, Atlanta.

Iggers, Georg and Q. Edward Wa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U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8.

Keylor, William 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Studi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1950-1970

Chen, Jo-shu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aiwan,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t NTU's History Department, the period of the 1950s and 1960s was one dominated by established schola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TU's History Department and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arphical tradition with a careful look at these scholars. It begins with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It points out a division within the tradition at its conception by illustrat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major founders of the tradition: Liang Qichao (1873-1929) and Fu Ssu-nien (1896-1950). The study proceeds to introduce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scholarly orientations of twelve long-time NTU history professors from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es of these professors. This study offers a view that four main approaches existed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ose emphasizing, respectively,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istorical explanation, schemes of overall historical courses, and lessons and meaning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Mainland Chinese historians brought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into NTU's History Department. The textual approach was the main stream and the explanatory approach played a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joshuichen@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condary role. Yet, in Taiwan, particularly after the 1960s, these two elements ca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other historiographical viewpoints. Consequently,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aiwan became complicated and conflicted. The situation remains to this day.

Keywords: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torical Studies in Taiwa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